

宋代齊魯詞人概觀

崔海正 著

中國文藝出版社

宋代齊魯詞人概觀

止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齐鲁词人概观/崔海正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华学人文稿/徐传武主编)

2000 ISBN 7-5059-3200-4

I. 宋… II. 崔… III.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V. 1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0536 号

书 名	宋代齐鲁词人概观
作 者	崔海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8 千字
印 张	9.81
印 数	0001-1500 册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200-4/I·2421
定 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序

刘乃昌

齐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基地,是人文景观源远流长辉煌璀璨的博大乡邦。在这片土壤上各个历史时期,都培育出不少文化名流、辞章精英。曲子词是有宋一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式,在曲坛词苑中,易安、幼安是齐鲁词人的杰出代表,也是词史上光芒四射的丽天巨星。二安的业绩文望,久已家喻户晓。但齐鲁词界的总体景观,其他作者的贡献风采,至今研究不多,开发较少。以此易于造成一种错觉,仿佛除上述两大家而外,齐鲁士人对两宋词苑的作为远逊于江左诸省。朗月赖有碧空衬,好花亦须绿叶扶。只有学界将研究目光在凝聚于代表性大家之外,不忽视对其他乡土词人予以关注,方能展示出这片园林的全景,而更能突现其中的翘楚。正是基于此种考虑,并得到省社科界大力支持,海正君方正式申报立项,对占籍齐鲁的词人开展全面研究的。

从区域文化视角对齐鲁一代词人进行综合研究,这是一项富有开拓性和艰巨性的课题。特别在稀见资料的发掘、疑难问题的破解、烛幽发微的探测等方面,均需付出艰辛努力。但作者不避艰难,奋力创新,历经寒暑,终于圆满完成了《宋代

齐鲁词人概观》这部适时的力作。

披览全书可知其中有不少值得注目之点。首先是书涉及有宋一代不同时期诸多词人,这些研究对象,有的作品传世甚少,事迹鲜为人知;有的尘封雾蒙,尚未进入词学研究界视野。著者对其里籍、行实、文字,查找线索,翻检史乘,爬罗剔抉,考索辨证,就其人其词专页补述,力求有见必录,无征不信,弥补研究空缺。其次书中从齐鲁地理环境、自然风物优势、文林名流行迹、学术文章氛围诸方面,勾勒了地域文化对齐鲁词人的浸润和熏陶,揭示了齐鲁词人成长的乡土背景。复次,书中由人伦道德、理想追求、心理好尚角度,审视齐鲁词人的精神风貌、人格范式、恋乡心态,展示了这一创作群体的共性品第。再者,书中还考论了齐鲁词人评赏词作、议论乐律、辑存前人手泽的业绩,说明他们对词学的贡献,及其在宋代词坛上的作用、地位与影响。

总之,是书在广泛涉猎材料的基础上,从多种视角对齐鲁词人群体作了多层面的考论研究。在全书结构的安排上,既以时序贯穿,又作地域性论证,做到纵横交织,个别审视与集群综论相结合。材料取舍,尽量与前此论述,彼详我略,力避重复;着意吸纳新近研究成果,补订前贤缺略。无论实证研究,或审美评赏,或理论升华,均力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逻辑谨严,自抒机杼,体现出作者卓然自立的识度和扎实深厚的功力。

自然由于本书议题所需客观条件局限,个别新说提供依

序

据稍感简略,某些独见放笔畅论尚可增强。唯崔君于教学、行政繁忙工作之余,只争朝夕地完成此洋洋可观的专题论著,允称难能可贵。治学之道,贵于知难而锐进,避熟而拓新,博览覃思,锲而不舍。斯编撰述过程中,崔君数度过余茅斋,谈及冥思幽讨之繁难,学术攻坚之甘苦。于斯正可体味到此君十分执著地体现了前代学者优良的治学精神。斯编行将付梓,海正君问序于余,本人虽缺乏研究,但对此课题亦颇感兴趣。爰略述感受,姑缀数语,聊表钦挹之怀云。

2000年3月于山东大学

目 录

序	刘乃昌
引言	1
第一章 宋代社会的人文景观与齐鲁词人略说	5
一 人文景观掠影	5
二 齐鲁词人略说	19
第二章 北宋齐鲁词人考述	29
一 前期词人	29
二 中后期词人	44
第三章 两宋之交齐鲁词人考述	72
一 年辈稍长的词人	72
二 年辈略晚的词人	89
第四章 南宋齐鲁词人考述	95
一 前中期词人	95

二 末期词人	115
第五章 齐鲁词人与宋代词学	133
一 词学评论	133
二 辑选词集	148
第六章 齐鲁词人与宋代词坛	156
一 词坛地位试测	156
二 词坛交游初描	171
第七章 宋代齐鲁词人的人格精神与乡恋情结	183
一 人格精神	183
二 乡恋情结	196
附 录	203
一 传记资料辑要	203
二 词作评论举要	288
主要参考书目	298
后记	301

引 言

本书试图对两宋时代的齐鲁词人逐一进行简要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个地域性词人群体进行总体性审视。

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主要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其一，宋代齐鲁词人除了人们非常熟悉的李清照、辛弃疾等几位名家，还有哪些人写过词，他们的情况如何，不仅一般读者知之不多，就是宋词研究者恐怕也未必十分清楚。笔者在学习宋词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到在几位名家之外，齐鲁之地还有好几十位词作者。虽然他们很少被人注意，现存作品的数量大都较少，有的只存一、二首，但却每每具有独特的品格与价值。而如果考察一下这些词人及其词作，或可为研究某些著名词人、重大论题、词坛公案等提供一点新的材料，以便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之进行评价。其二，二十世纪宋词研究的格局极不平衡。据南京师范大学编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统计，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作者为一千四百九十三人，作品二万零五十五首（其中包括无名氏词作一千五百六十九首）；又据王兆鹏、刘尊明两位先生《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一文（见《百年文学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所作的数据分析，宋代词人进入本世纪词学研究者视野的仅有六十一

人(其作品总数至多在五、六千首左右),而研究热点又主要集中在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三人身上(其作品总数一千首稍多),有关他们的论著超过了其他所有两宋词人研究论著的总和。这就是说,极少数词人和问题被多次重复研究,绝大多数词人则没有引起关注。这不仅是宋词研究中的一种浪费,而且因为研究面较为狭窄,势必影响到对宋代词坛的整体观照,因而也就难以对某些重要问题作出更加合乎实际的论断。自然,要对一千五百位左右的词人一个一个进行研究,并非一件易事;想要研究,也可能有多种途径。但笔者以为,将分布于现今十几个省市的宋代词人,由研究者通力合作,按照地域分别加以梳理,则不失为一种方法,本书正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其三,把齐鲁词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齐鲁文化的内涵、特质、历史承传等,至少便于从一个侧面探索古代某一类型的地域文化与当时整个大文化的关系及其流变,并从中得到一些有意义的启发,为当今的地域文化研究提供参照。

然而,困难实在太多。比如,越是不大知名的词人资料越少,要寻找到一条可用的材料谈何容易!有时即使有点线索,却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目的。何况,涉及到几十位词人,远比搜集一、二位词人的资料困难得多。再如,笔者原意在重点考察那些前此不被看重的齐鲁词人,但易安、稼轩等毕竟是这个大家族中的显赫代表,有关他们的论著又如此之多,要研究齐鲁词人自然不能缺少他们,于是,如何避免重复

叙述,适当选择、组织材料也成了一个问题,而在有些地方也不得不改变初衷。又如,齐鲁词人的生活年代从宋初直贯宋末,有的还跨入元代,成为遗民词人。如果说遗民词人仍可归属宋代,比较好办,那么,在南宋时期,齐鲁词坛实际成为金代词坛的一部分,使不少齐鲁词人丢失了这个“出发点”和“根据地”,而活跃在金代齐鲁词坛上的词人,又基本上都是齐鲁籍词人,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则比较棘手。考虑到本课题是研究宋代的齐鲁词人,最终只好置金代齐鲁词坛于不顾,只在适当地方简略触及。又如,以祖籍作为判定是否齐鲁词人的标准已颇费踌躇,而祖籍的情况又特别复杂。有的词人曾成长于齐鲁并受到该地域文化的熏陶,如范仲淹,然其祖籍却不在此地;如果将其归属齐鲁,则类似的情况就很难掌握。而祖籍,这个概念的时间界限极为模糊。如果追溯太远,有的词人就会被排除在齐鲁占籍之外,如辛弃疾,他的祖先是甘肃狄道迁来济南的,但没有人说他是甘肃籍词人;晁补之等几位晁氏家族的词人亦有类似情况。如果求之太近,有的词人也会失去这一资格,如周密,他并非生长于齐鲁,一生也未到过该地,但不仅他自己,一般人都认为他是齐鲁人。也有的由于种种原因由齐鲁迁徙外地,还有的迁入迁出的时间暂不清楚等等,横七竖八,有时难下判断。于是,姑且按照习惯看法,或知其父祖辈占籍齐鲁的,即视为齐鲁词人。由外地迁入时间较短的,则不计在内。当然,最大的困难还在宏观概括的乏力,除了资料的贫弱,主要是知识储备和理论修养的不足,使

笔者真正感受到了“力不从心”这几个字的含意。

本书拟分七章。首章对两宋社会的人文景观及齐鲁词坛概貌略加勾勒；次三章分三个阶段，大体按时间先后对近四十位齐鲁词人逐一进行评述。就每一阶段而言，基本是横断面的考察。三个阶段贯穿起来，则又形成一个纵向的系列；最后三章就齐鲁词人对宋代词学的贡献、词坛地位及其人格精神等加以探讨，意在于纵横交织中综合体认。这样，或许能够对两宋时代的齐鲁词人有一个较为具体而完整的印象。框架虽然如此，思路或不大谬，然如上述，因受其才识、学力之困，考述、评论均极浮薄，发掘不多，成果很难达到“设计要求”，实在令人遗憾！不过，正文之后附录两个资料，虽择其要者，却尊重原貌，或可使读者据以指正笔者之谬，并通过读者的明察及再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

鲁迅先生在《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言中说：“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笔者为齐鲁人，自然为齐鲁文化曾经有过的辉煌而骄傲，但此处无意吹嘘乡土文化，只不过想叙述文学史（词史）上的一段史实。而且，齐鲁文化毕竟是灿烂的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有自己的特点，更具中华文化的共性，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物。所以，本书其实是在探测一条小径，期待着在宋词艺苑的一隅，以一株并不美丽的“野芹”，映衬地域性词人研究那琼花竞妍的時刻的到来。

第一章 宋代社会的人文景观 与齐鲁词人略说

一 人文景观掠影

宋代齐鲁词人自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但其与所生存时代的社会环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过,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对两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这些属于文学“背景”方面的东西作过于泛化的全面性表述,而只想就与文学而主要是词学有更为直接关系的某些因素,择要加以介绍。

有宋一代儒宗、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如果说“穷而后工”算是诗文创作的一条规律,那么,它对于歌词创作却有点不大适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词是一种“富贵文学”。当然,这里所谓“穷”,并非仅仅指经济方面,但其中着实也涵纳着生活困顿、穷愁潦倒这层内容。而词的创

作,作为其主流与主要构成部分的文人词,其诞生与传播大半在秦楼楚馆与歌舞宴筵之上,这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的。人们熟知,宋代是所谓“积贫积弱”的时代。的确,比起“盛气凌人”的大唐,它地蹙势弱,常使人怒其不争,感到憋气;但就其“富有”的程度而言,它却要胜唐一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载,宋初岁入缗钱六百余万,已两倍于唐室;仁宗嘉祐间,增至三千六百余万;神宗熙丰间,又增至六千余万;至南宋淳熙末,半壁江山竟达六千五百余万。国库的收入当然不应排除过分“盘剥”的事实,但也并非全是“竭泽而渔”。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宋代是一个“富而不强”的时代。富与不强是一对矛盾,宋代很多事情皆从此发源,词在宋代的大盛,从深层动因上看,也即植根于这个“基本国情”。打个比方说,词就象一位羸弱的、多情善感的“富姐儿”,在两宋时代碰到了最好的机遇与最适宜的“气候”。

宋代国家富裕的一个重要原因得利于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商业经济与城市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又造成了市民阶层的勃兴,歌词则是最受市民欢迎的文学样式之一。因为市民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和现时享受,喜欢歌舞、说唱这类娱乐性较强的文艺活动,所以,宋词的兴盛还在于宋代城市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宋代是极为重要的阶段,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坊市制度的彻底崩溃。所谓坊市制度,指古代城市中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均严格限制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并规定了严格的启闭时

间,这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崛起,这个制度开始动摇,到北宋仁宗时期,已被基本摧垮,大城市中商业区街、早市、夜市、瓦肆等商业活动已相当活跃。另一个标志是,十一世纪初,北宋王朝以户籍形式将全国居民分为坊廓户和乡村户,坊廓户的单独列籍表明市民群体正式登上了社会舞台,这当然是城市及其商贸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北宋都城东京为例,城周长五十余里,分外城、里城、宫城三重,陆路、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据吴涛先生《北宋都城东京》一书的考证与推算,徽宗崇宁年间,东京常住在编人口已达八十万左右,加上各类官员、驻军、客商、游人等,可达一百四十万左右,十倍于汉唐京邑民庶,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市面繁华的程度,人们爱称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的一段记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在这样的都市里,游乐场所真是应有尽有。瓦子是一种综合游艺场,其中演出各种伎艺的场子叫做勾栏或叫做棚。东京瓦子很多,规模也很大。《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很多瓦子的名称及活动情况,如该书卷二记“东角楼街巷”云:“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

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逢到各种节日，舞场歌馆、乐棚、影戏勾肆，更是鳞鳞相切，乐声嘈杂，狂欢不已。南宋都城杭州亦不甘落后，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云：“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蹕，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亦云杭州“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騃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足见其繁盛。其游乐场所，该书卷五记有八个风景区段，四百五十余处风景名胜点；卷六记瓦子二十三处，内有勾栏甚多，仅北瓦就有十三座，尚多有不入勾栏做场者。又官库酒楼十一处，市楼十八处，“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而耐得翁《都城纪胜·序》中更谓杭城“民物康阜，视京师（指北宋东京）其过十倍矣”；述其“瓦舍众伎”，则有“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有“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等等，在这市井骈集、歌舞不休、朝夕沉醉的城市社会氛围中，作为“流行歌曲”的歌词，如果不风靡里巷，那才真是一桩怪事！

歌词一般通过歌妓的演唱及书肆坊铺的刊刻而流播社会，这是词人与听众或读者进行交流的中介。宋代是中国娼妓制度的鼎盛时代，人数众多，但其中多是艺妓，并非全是以卖身为主。她们大致可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类。官妓多